

# 西周早期南征青銅器群及 相關史實考察

王 祁

西周早期有一組記載“伐楚”、“伐荆”、“伐楚荆”與“伐虎方”的青銅器群，唐蘭先生認為這群青銅器記載着周昭王南征的史實，故此青銅器群屬於昭王時期。<sup>〔1〕</sup>自唐蘭先生全面整理昭王時期青銅器群起，衆多學者參與到有關問題的討論中，但對於這些青銅器的理解，學界並沒有取得完全一致的結論，仍有許多的爭論圍繞着南征的對象與時間展開。問題的焦點有下面兩點：

首先是唐蘭先生所謂的伐楚青銅器是否屬於昭王時期。馬承源<sup>〔2〕</sup>、李學勤<sup>〔3〕</sup>、朱鳳瀚<sup>〔4〕</sup>、彭裕商<sup>〔5〕</sup>、王世民<sup>〔6〕</sup>等先生基本認同唐先生的觀點，但陳夢家<sup>〔7〕</sup>、劉啓益<sup>〔8〕</sup>、杜勇、沈長雲<sup>〔9〕</sup>等先生反對此觀點（見下文）。其次，關於伐虎方與伐楚兩組器物所載是否是一場戰爭的問題，一部分學者明確將“征虎方”和“征楚荆”視為兩場戰爭，<sup>〔10〕</sup>但許多學者都沒有將兩組性質不同的器組區分開來，<sup>〔11〕</sup>認為

〔1〕唐蘭：《論周昭王時代的青銅器銘刻》，《古文字研究》第二輯，第18—142頁，中華書局2005年。

〔2〕馬承源：《商周青銅器銘文選》三，第61—79頁，文物出版社1990年。

〔3〕李學勤：《基美博物館所藏令簋的年代》，《法國漢學》第十一輯，第128—131頁，中華書局2006年。

〔4〕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中）》第1270—127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5〕彭裕商：《西周青銅器年代綜合研究》第255—270頁，巴蜀書社2003年。

〔6〕王世民、陳公柔、張長壽：《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年。

〔7〕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上）》目錄頁，中華書局2004年。

〔8〕劉啓益：《西周紀年》，廣東教育出版社2002年。

〔9〕杜勇、沈長雲：《金文斷代方法探微》第52—88頁，人民出版社2002年。

〔10〕劉禮堂：《關於周昭王南征江漢地區有關問題的探討》，《江漢考古》2000年第3期；王占奎：《關於靜方鼎的幾點看法》，《文物》1998年第5期。

〔11〕彭裕商：《西周青銅器年代綜合研究》第265—270頁，巴蜀書社2003年；李裕鈞：《新出銅器銘文所見昭王南征》，《新出金文與西周歷史》第275—28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伐“虎方”可能是征“楚荆”下的一場局部戰役。關於第二個焦點,李學勤先生早年也是將兩組青銅器記載的事情視爲昭王南征下的不同階段,用以排列昭王十七年到十九年的曆日;〔1〕後來李先生重排了昭王南征曆日,開始把征楚組青銅器置於昭王十五到十六年,而把伐虎方組器(李先生認爲是南巡組)的時代定爲昭王十八年到十九年,且爲了契合中方鼎的曆日將昭王死日放在十九年的次年。〔2〕

本文基於前輩學者的研究現狀,再次強調西周早期南征青銅器群分組的必要,然後依據青銅銘文、紋飾和有關古史傳說判斷不同青銅器組的具體年代,最後簡略探索昭王南征對江漢平原政治局勢變遷的影響,希望有助於周昭王南征相關問題的解決。

## 一、西周早期南征青銅器群分組

自郭沫若、陳夢家二位先生整理商周青銅器後,青銅器分組斷代的方法被廣泛應用於青銅器研究中。〔3〕所謂青銅器分組斷代法,是指把一組銘文相聯繫的青銅器群綜合起來考慮的一種方法,其組內青銅器依靠銘文中的事件、人物、地點和時間相聯繫,爲該組青銅器時代的判定提供儘可能多的信息。這一方法也可以應用於西周早期南征青銅器群斷代中,我們自綫索較爲清楚的“伐楚荆”組開始整理,然後再討論“伐虎方”組青銅器。

西周早期“伐楚荆”青銅器組(見表 1)主要是因爲常見“王伐楚”、“王伐荆”、“征楚荆”等記錄而較易歸納,另外啓尊(《集成》5983)、啓卣(《集成》5410)、小子生尊(《集成》6001)、堆叔鼎(《集成》2615)可與欒馭簋(《集成》3976)中的“王南征”相關聯,召尊(《集成》6004)因時間與地點而與作册卣(《集成》4300)相關聯。需要注意的是堆叔鼎與該簋中都有“堆叔”,可證西周早期的周王南征與周王伐楚是同一事。劉啓益先生將令簋看作康王時器、將堆叔鼎等定爲昭王者,〔4〕他認爲伐楚是歷代周王常有之事,不必認爲只有昭王可伐楚,成王、康王亦可能征伐南國。雖然伐南方的周王不僅有昭王,〔5〕但周初伐楚是大事,不僅文獻沒有任何記錄,且著名的牆盤(《集成》

〔1〕李學勤:《靜方鼎與周昭王曆日》,《夏商周年代學札記》第 22—30 頁,遼寧大學出版社 1999 年。

〔2〕李學勤:《基美博物館所藏令簋的年代》,《法國漢學》第十一輯,第 128—131 頁。


〔3〕彭裕商:《西周青銅器年代綜合研究》第 1—12 頁。

〔4〕劉啓益:《西周紀年》。

〔5〕從新見的“曾侯與編鐘”(《江漢考古》2014 年第 4 期)可知,西周初年(當成王年間)應該有一次對南方的征伐活動。

10175)與逯盤(《文物》2003年第6期)也只是說昭王伐“楚荆”。故此我們認為具備西周早期器形特點且記載着“王伐楚”或“王南征”事迹的青銅器是同一場戰爭的結果。

表 1 西周早期“伐楚荆”青銅器組表

序號	器名	相關史事	資料來源
1	京師駿尊	王涉漢伐楚,王有戡功,京師駿呂斤功釐貝,用作日庚寶尊彝。 	《文物》 2010年第1期
2	過伯簋	過伯從王伐反荆,俘金。	《集成》3907
3	肅簋	肅從王伐荆,俘。	《集成》3732
4	猷馭簋	猷馭從王南征,伐楚荆,有得。	《集成》3976
5	啓尊	啓從王南征,遶山谷、在泃水上。	《集成》5983
6	啓卣	王出狩南山,甬遶山谷,至于上侯曉川上,啓從征。	《集成》5410
7	小子生尊	唯王南征,在□,王令生辦事□公宗,小子生賜金。	《集成》6001
8	唯叔鼎	唯叔從王南征,唯歸,唯八月,在甬卬。	《集成》2615
9	諶簋	唯九月,唯叔從王員征楚荆,在成周。	《文物》 1986年第1期
10	作册 令簋	惟王于伐楚伯,在炎。 <sup>〔1〕</sup> 惟九月既死霸丁丑,作册 令尊宜于王姜,姜賞令貝十朋、臣十家、鬲百人。 公尹伯丁父賜于成(下略)	《集成》4300
11	召尊	唯九月,在炎自,甲午,伯懋父賜召伯馬(下略)	《集成》6004

“伐虎方”組青銅器(見表 2)以著名的“安州六器”為代表。“安州六器”是北宋重和年間發現於安陸(今湖北孝感)的一組有銘青銅器,雖然有學者認為“安州六器”具體指哪幾件青銅器尚存疑問,<sup>〔2〕</sup>但學界一般認為“安州六器”就是著錄於《博古圖》和《鐘鼎彝器款識》中的與南宮伐虎方有關的六件器物(記方鼎三、圓鼎一、觶一、甗一)。<sup>〔3〕</sup>中方鼎甲記載“唯王令南宮伐反虎方之年”,這與新出敔鬲中的“王令南宮[伐]虎方之年”是一致的,<sup>〔4〕</sup>再次證明將“虎方”釋為“荆方”是不合適

〔1〕此處斷句從陳夢家先生說,詳見陳氏著《西周銅器斷代》第 29—31 頁。

〔2〕劉昭瑞:《“安州六器”辯》,《文物》1992 年第 10 期。

〔3〕杜勇:《安州六器與麥氏四器年代考辨》,《管子學刊》2001 年第 4 期。

〔4〕孫慶偉:《從新出敔鬲看昭王南征與晉侯燹父》,《文物》2007 年第 1 期。

的。〔1〕另一件與“安州六器”明顯關聯的器物是靜方鼎，〔2〕靜方鼎記載“令師中眾靜省南國相”，銘文“師中”當是作器者“靜”對中方鼎之“中”的尊稱，靜方鼎與安州六器可歸為一組。與安州六器相關聯的另一組青銅器是“王在斥”組，包括析尊（《集成》6002）、遣尊（《集成》5992）、作冊鬯卣（《集成》5407）、作冊鬯尊（《集成》5989），此組器物皆有“王在斥”語。中方鼎乙記載“唯十又三月庚寅，王在寒飭（次）”，這比遣尊“唯十又三月辛卯，王在斥”早一日，前人早已據此將兩組器物相關聯，〔3〕本文認為這是較為合理的。

表 2 西周早期“伐虎方”青銅器組表

序號	器名	史事銘文	資料來源
1	鞞	唯十又〔二〕月，王令南宮〔伐〕虎方之年，〔唯〕正月既死霸庚申，王在宗周，王〔令〕□鞞〔使〕于繁，錫貝五朋。	《文物》 2007年第1期
2	中方鼎甲	唯王令南宮伐反虎方之年，王令中先省（省）南國貫行，執王居在 隳 隳真山。	《集成》2751
3	中觶	王大省公族，于庚振旅。	《集成》6514
4	靜方鼎	唯十月甲子，王在宗周。令師中眾靜省南國相，執居。八月初吉庚申，至，告于成周。月既望丁丑，王在成周大室，令靜曰：“俾汝□司在曾、噩自。”王曰：“靜，賜汝鬯、旂、市、采罍，曰用事。”靜揚天子休，用作父丁寶尊彝。	《文物》 1998年第5期
5	中觶	王令中先省南國貫行，執居在曾。史兒至，以王令曰：“余令汝使小大邦，厥又舍汝芻糧，至於女庸小多□。”中省自方、鄧、復□邦，在噩自次。伯買父□□率人□漢中州，曰段、曰旂。	《集成》949
6	中方鼎乙	隳（唯）十又三月庚寅，王在寒飭，王令大史貺福土。	《集成》2785
7	析尊	唯五月，王在斥，戊子，令作冊析貺望土于相侯，錫金錫臣。……唯王十又九祀，用作父乙尊……	《集成》6002

〔1〕黃錫全：《“安州六器”及其有關問題》，《古文字與古貨幣文集》第94—101頁，文物出版社2009年。

〔2〕李學勤：《靜方鼎與周昭王曆日》，《夏商周年代學札記》第22—30頁。

〔3〕唐蘭：《西周銅器斷代中的“康宮”問題》，《考古學報》1962年第1期；李學勤：《靜方鼎與周昭王曆日》，《夏商周年代學札記》第22—30頁。

續 表

序號	器 名	史 事 銘 文	資料來源
8	遣尊	唯十又三月辛卯，王在斥，賜遣采，曰：趙，賜貝五朋。	《集成》5992
9	作册鬯卣	唯十又九年，王在斥。王姜令作册鬯安夷伯，夷伯賓鬯貝布。	《集成》5407
10	作册鬯尊	在斥，君令余作册鬯安夷伯。	《集成》5989

上述兩組青銅器是筆者在前輩學者成果基礎上按照青銅器銘文的內在關聯劃分的，筆者認為關聯不同青銅器時一定要綜合考慮各種因素，並以各關聯因素中主要部分作為關聯的標準。比如“伐虎方”組中的作册鬯卣與“伐楚荆”組中的作册 卣 令簋都有王姜，杜勇、沈長雲二位先生據此認為包括作册鬯卣在內的“王在斥”器與作册 卣 令簋等器記載着同一場戰爭的不同過程。<sup>〔1〕</sup> 筆者傾向認為王姜既然是西周早期重要人物，那麼她出現於不同事件中的概率是很大的。叔簋（《集成》4133）就記載周王奉於宗周、王姜派人聯絡太保一事，足見王姜之活躍。故此，筆者認為將作册鬯卣歸為與之時間聯繫更加緊密的“伐虎方”組是相對可靠的，畢竟閏十三月的相連兩日較為罕見。

“伐虎方”組青銅器和“伐楚荆”組青銅器是不同的兩場戰爭，這點雖然李學勤先生已經做了不同的曆日排譜，<sup>〔2〕</sup>但我們認為有必要再次予以強調。劉禮堂先生認為伐楚和伐虎方的不同之處不僅表現在征伐對象上，還包括領軍的將領、戰爭的安排和進程、戰爭的後果等等，<sup>〔3〕</sup>正是這些不同之處決定了伐楚和伐虎方是兩場不同的戰爭，這是分組的重要依據。

## 二、西周早期南征青銅器 群具體年代的判定

唐蘭先生將西周早期南征青銅器群的年代全部斷為昭王時期，其依據是先秦時期廣為流傳的昭王南征荆楚的傳說，<sup>〔4〕</sup>而且牆盤（《集成》10175）有“宏魯昭王，廣毘

〔1〕 杜勇、沈長雲：《西周斷代方法探微》第52—88頁。

〔2〕 李學勤：《基美博物館所藏令簋的年代》，《法國漢學》第十一輯，第128—131頁。

〔3〕 劉禮堂：《關於周昭王南征江漢地區有關問題的探討》。

〔4〕 唐蘭：《論周昭王時代的青銅器銘刻》，《古文字研究》第二輯，第18—142頁，中華書局2005年。

楚荆,唯安南行”的記載,速盤(《文物》2003年第6期)也說“用會昭王、穆王,施政四方,撲伐楚荆”。最近新出現的穆王年間的胡應姬鼎明確記載“唯昭王伐楚荆,胡應姬見于王”,〔1〕可證周昭王確實曾有南征荆楚的壯舉,所以現今多數學者都贊同唐蘭先生的觀點。正如本文一開始所言的那樣,仍有一部分學者不贊同將西周早期南征青銅器群定為昭王時代,而且不同學者對“伐楚荆”組和“伐虎方”組有着不同的斷代依據,這導致了西周早期南征青銅器斷代分期的混亂。表3是與此問題有關的一些學者的斷代觀點,從中可見這個問題仍未完全解決。既然西周早期南征青銅器群斷代問題的本質是如何與歷史事件相對應,那麼解決這個問題的前提仍然是對文獻的梳理。所以本文從文獻着手,希望找到判斷“伐楚荆”青銅器組和“伐虎方”青銅器組年代的綫索。

表3 西周早期南征青銅器群斷代觀點一覽表

學者分類	“伐楚荆”組			“伐虎方”組		
	成王	康王	昭王	成王	康王	昭王
郭沫若〔2〕	●			●		
陳夢家〔3〕	●				●〔4〕	
唐蘭〔5〕			●			●
馬承源〔6〕			●			●
劉啓益〔7〕		●	○〔8〕	●		
王世民等〔9〕			●			●
李學勤〔10〕			●			●

〔1〕李學勤：《胡應姬鼎試釋》，《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六輯，第109—11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胡應姬鼎銘文是追憶，所以不在本文統計範圍。

〔2〕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郭沫若全集》第八卷，科學出版社2002年。

〔3〕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目錄頁。

〔4〕陳氏從形制上判斷安州六器(中組)為成、康時器，並置“中組”為康王下，惜存目未寫。

〔5〕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

〔6〕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三。

〔7〕劉啓益：《西周紀年》。

〔8〕值得注意的是，劉氏認為西周伐楚是常有之事，故把伐楚諸銅器置於不同周王時代。另外，劉氏將靜方鼎與安州六器置於不同時代，缺乏說服力。

〔9〕王世民、陳公柔、張長壽：《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

〔10〕李學勤：《靜方鼎與周昭王曆日》，《夏商周年代學札記》第22—30頁。

續 表

學者分類	“伐楚荆”組			“伐虎方”組		
	成 王	康 王	昭 王	成 王	康 王	昭 王
彭裕商〔1〕			●			●
杜勇、沈長雲〔2〕	●				●	

昭王南征是西周歷史的一件大事,《左傳·僖公四年》載:

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

這段話中的“昭王南征而不復”是管仲詰問楚國使者的罪責之一,說明春秋時人認為昭王在南征途中的死亡是與楚人脫不了干係的;但究竟何種關係,也許管仲自己都不太清楚,故此楚國使者才可以很自信地回答“君其問諸水濱”。《左傳》中的記載過於隱晦,詳細的記載還可以從以下諸書中尋求:

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漢,遇大兇。(古本《竹書紀年》)

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暄,雉免皆震,喪六師於漢。(古本《竹書紀年》)

周昭王末年,夜有五色光貫紫微。其年,王南巡不返。(古本《竹書紀年》)

昭王成游,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楚辭·天問》)

周昭王親將征荆,辛餘靡長且多力,為王右。還反涉漢,梁敗,王及蔡(祭)公扞於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又反振蔡(祭)公。周公乃侯之於西翟,實為長公。((《呂氏春秋·音初》)

昭王之時,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其卒不赴告,諱之也。((《史記·周本紀》)

〔1〕 彭裕商:《西周青銅器年代綜合研究》第255—270頁。

〔2〕 杜勇、沈長雲:《西周斷代方法探微》第52—88頁;杜勇:《安州六器與麥氏四器年代考辨》;沈長雲:《靜方鼎的年代及相關歷史問題》,《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3年第7期。

昭王德衰，南征，濟於漢，船人惡之，以膠船進王，王御船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蔡(祭)公俱沒於水中而崩。其右辛游靡長臂且多力，游振得王，周人諱之。(張守節《史記正義》引皇甫謐《帝王世紀》語)

昭王南伐楚，辛由靡由右，涉漢中流而隕，由靡逐王，遂卒不復，周乃侯其後於西翟。(司馬貞《史記索隱》引宋衷云)

從古本《竹書紀年》可知，昭王有兩次南征，十六年的伐楚荆和十九年的“南征不返”。以上引文雖多，然除較晚的《史記索隱》，沒有一則明言昭王“南征不返”是由楚國造成的。故此一些學者並不贊同昭王之死與征楚有關係，<sup>〔1〕</sup>且認為《呂氏春秋·音初》中“周昭王親將征荆”之“荆”當是北方對南方的蔑稱。<sup>〔2〕</sup>本文認為這種考慮是正確的，昭王十六年和十九年只間隔三年，在極短的時間內由周王親征同一南方小國，<sup>〔3〕</sup>這是很不可思議的一件事情。所以，由年代較早的《左傳》、古本《竹書紀年》和《楚辭·天問》等文獻可知，十九年的南征確實是一個未解之謎，昭王之死或許與楚國並無關係。有學者認為昭王十九年的南征是爲了剪除位於南方的商遺民，<sup>〔4〕</sup>證據是商人爲鳥崇拜，《楚辭·天問》“逢彼白雉”即是討伐商遺民。這種說法是存在漏洞的，我們姑且不論商人是否是鳥崇拜，西周青銅器大量的鳳鳥紋顯示周人也可能存在鳥崇拜，何以單單言“逢彼白雉”是指商遺民，而不是周叛族？

由以上可知，昭王十六年的“伐楚荆”是言之鑿鑿而又能爲牆盤和逯盤證明的，所以本文認為牆盤所謂“宏魯昭王，廣黻楚荆”是昭王十六年進行的，而昭王十九年的南征不獨不知其討伐的對象，這場征伐還對西周王朝造成極大的損害，以致“喪六師於漢”。這種區分對於西周早期南征青銅器組的斷代是很有幫助的。前文曾提到李學勤先生據此把“伐楚荆”組青銅器置於昭王十五到十六年，把“伐虎方”組定爲昭王十八年到十九年，<sup>〔5〕</sup>本文大體遵從李先生的觀點，但增加幾點新的考慮。

〔1〕 趙慶森：《“昭王南征而不復”之蠡測》，《學術月刊》2015年第5期；劉禮堂：《關於周昭王南征江漢地區有關問題的探討》，李學勤：《基美博物館所藏令簋的年代》，《法國漢學》第十一輯，第128—131頁。

〔2〕 龔維英：《周昭王南征史實索隱》，《人文雜誌》1984年第6期。


〔3〕 《左傳》昭公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筮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川，以事天子。”《國語·晉語八》：“昔成王盟諸侯於岐陽，楚爲荆蠻，置茅蕪，設望表，與鮮牟守燎，故不與盟。”可見西周早期的楚國並不強大。

〔4〕 龔維英：《周昭王南征史實索隱》；曹建國：《昭王南征諸事辨考》，《阜陽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5期。

〔5〕 李學勤：《基美博物館所藏令簋的年代》，《法國漢學》第十一輯，第128—131頁。



首先，“伐楚荆”組青銅器的年代一直存在極大爭議，因為這涉及王姜、作册 𠄎 令等重要人物的年代，杜勇、沈長雲〔1〕等先生都不同意將此組青銅器置於昭王時代。他們認為成王時期的禽簋、岡劫尊中的“王伐奄侯”當釋為“伐楚”，這就證明了成王時期有伐楚的事實。不過周原甲骨〔2〕顯示西周初年周、楚的關係是和睦的，認為成王時期即已伐楚的觀點繞不過這個矛盾點。最近公布的京師峻尊〔3〕銘文可以為這個爭論畫上句號：

王涉漢伐楚，王又(有)戩工(功)，京師峻目斤工(功)釐貝，用作日庚寶尊彝。

京師峻尊銘文中的“王涉漢伐楚”直接與古本《竹書紀年》中“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漢”相對應，可證明京師峻尊確實是記載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荆事的。京師峻尊的重要性在於，它以地下銘文與地上文字相一致的“二重證據法”證明了十數件“伐楚荆”組青銅器確實是周昭王十六年的器物。

其次，“伐虎方”組青銅器可與文獻對應的地方是析尊和作册 𠄎 卣中的“十又九祀”、“十又九年”，所以李學勤先生將此組器物的時期定為昭王末年，我們認為這是合適的。但沈長雲先生認為靜方鼎的器型和紋飾古樸，可與成、康之際的德方鼎對比，判斷靜方鼎的年代也不會晚於成康年間，進而認為包括靜方鼎在內的“伐虎方”組青銅器反映的是西周初年太保玉戈中的“命太保省南國”事。〔4〕沈先生的視角很敏銳，靜方鼎的器型和紋飾確實有周初風采。但我們判斷一組青銅器的年代是由該組青銅器中年代最晚的一件作基點的，而不是由器型較早的一件作尺規，這與西周青銅器演變過程中的非均衡性〔5〕有關。“伐虎方”組青銅器中器型最晚的是鞞鬲。孫慶偉先生指出，北趙晉侯墓地 M114 出土的鞞鬲與陝西長安張家坡出土的孟貝鬲非常接近，都是西周早中期之際的器物，〔6〕這與 M114 的年代是一致的。〔7〕由鞞鬲的年代可否定伐虎方與太保南巡的聯繫，故此本文斷定包括鞞鬲在內的“伐虎方”組青銅器群

〔1〕杜勇、沈長雲：《西周斷代方法探微》第 52—88 頁；杜勇：《安州六器與麥氏四器年代考辨》；沈長雲：《靜方鼎的年代及相關歷史問題》。

〔2〕王宇信：《西周甲骨探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4 年。

〔3〕李學勤：《由新見青銅器看西周早期的鄂、曾、楚》，《文物》2010 年第 1 期。

〔4〕沈長雲：《靜方鼎的年代及相關歷史問題》。

〔5〕張懋鎔：《試論西周青銅器演變的非均衡性問題》，《考古學報》2008 年第 3 期。

〔6〕孫慶偉：《從新出鞞鬲看昭王南征與晉侯燹父》。

〔7〕北京大學文博學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馬一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第六次發掘》，《文物》2001 年第 8 期。

的年代在西周早中期之際。

再次,李學勤先生將“伐虎方”組曆日排出昭王十九年之外,即認為存在一個昭王二十年,作為古本《竹書紀年》中提到的“末年”。李先生認為此年昭王南征不返,穆王即位,改元為穆王元年。此觀點甚有新意,發人深思。但筆者仍然傾向認為古本《竹書紀年》的“周昭王十九年”與“周昭王末年”是同一年,或為後人引用時的一事兩述。以此觀點,本文重新編排“伐虎方”組曆日,其關鍵在於如何理解伐虎方與昭王南巡二者的關係。

我們讀“伐虎方”組銘文,知道這場戰爭是南宮指揮的,這說明昭王沒有親自參與這場戰爭,因為周王親征要強調“王伐某某”,如“伐楚荆”組中的“王伐楚”、“王伐荆”。但無論是“王在寒飈”還是“王在斥”都表明昭王曾經距離戰場很近,且中方鼎甲說“王令中先省南國貫行,執王居”,可見昭王確實去過南國。那麼如何理解昭王不是戰爭的主導者却親臨南國這一史實呢?較為合理的解釋是昭王先是命令南宮伐虎方,在伐虎方戰役的同時或稍後組織了一次盛大的巡視南國的政治活動,也就是古本《竹書紀年》中的“南巡”和《楚辭·天問》中的“昭王成游”。西周早年周王或王室重臣南巡之事並非只此一件,太保玉戈記載的“命太保省南國”就是明證。<sup>〔1〕</sup> 牆盤載“宏魯昭王,廣讎楚荆,唯突南行”,其“唯突南行”既可能是昭王十六年“廣讎楚荆”後進行的,也可能說的是昭王十九年的南巡。後一種解讀還可在中方鼎甲中得到印證:

唯王令南宮伐反虎方之年,王令中先省(省)南國貫行,執王居在𠄎障真山。

這段話似乎在暗示“南宮伐反虎方”只是單純的紀年,而周王派遣中“省南國貫行,執王居”是與南宮伐虎方同時進行的。基於此,本文嘗試重排“伐虎方”組青銅器曆日:

周昭王十七年:十月甲子,王在宗周。令師中眾靜省南國相,執居(靜方鼎)  
十又[二]月,王令南宮[伐]虎方(鞞甗)

周昭王十八年:正月既死霸庚申,王在宗周,王[令]□鞞[使]于繁(鞞甗)  
八月初吉庚申,至,告于成周(靜方鼎)  
月既望丁丑,王在成周大室,令靜曰:“俾汝□司在曾、噩自。”(靜方鼎)

〔1〕李學勤:《太保玉戈與江漢的開發》,《楚文化研究論集》第二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

唯十又三月庚寅，王在寒師（中方鼎乙）

唯十又三月辛卯，王在斥，賜遣采（遣尊）

周昭王十九年：唯五月，王在斥，戊子，令作册析貺望土于相侯（析尊）

以上曆日說明周昭王南巡是一件大事，即牆盤所謂的“唯寅南行”。爲了保證這次南巡的安全，周昭王先是讓中與靜前往南國觀察，後又派南宮討伐虎方，到昭王十八年，靜先行回成周向昭王報告情況，昭王令靜“在曾、噩自”，爲其南巡做進一步的準備。昭王十八年的十三月，昭王此時應該已經到達南國，與在那裏的中、南宮等人會合，所以才有中觶（《集成》6514）中的“王大省公族”。其後昭王迅速趕到斥地，並在那裏待到次年的五月，此“斥”當在南國，而不在汧渭之會。<sup>〔1〕</sup>此後不久，昭王開始返回成周，在回去的路上遭到某種阻礙，才導致“喪六師於漢”、“南征不返”。

### 三、餘論：周昭王南巡的政治影響

本文基於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將西周早年的南征青銅器群分爲“伐楚荆”組和“伐虎方”組，並認爲兩組青銅器是兩次不同的戰爭，不可混淆。本文認爲京師峻尊的發現進一步證明了“伐楚荆”組青銅器可與古本《竹書紀年》記載的昭王十六年征楚荆對應；而“伐虎方”組青銅器則可與昭王十九年相聯繫。在梳理文獻的基礎上，本文認爲昭王晚年前往南國可能不是以征伐某一方國部落爲主的，而是一次盛大的南巡，即牆盤稱頌的“唯寅南行”。本文由此出發認識到“伐虎方”組青銅器中記載的南宮伐虎方與昭王令中和靜省南國的事情都是爲此做準備的，即這兩件事是同時進行、互爲表裏的，本文以此爲基礎重新排列了“伐虎方”組的曆日。

下面簡略討論下周昭王南巡的政治影響。

學界在討論周昭王“南征不返”的政治影響時，有種觀點認爲雖然昭王的南巡是以失敗告終，但他目標却是達成了，並且鞏固了周人在南方的統治地位，<sup>〔2〕</sup>即速盤所說“施政四方，撲伐楚荆”。但這種評價並不能爲西周中期的南方形勢所證明。由鞞、中甗、作册畀卣和析尊可知，昭王南巡肩負拉攏和穩定南方諸侯的任務，昭王這樣

〔1〕 盧連成：《斥地與昭王十九年南征》，《考古與文物》1984年第6期。

〔2〕 唐蘭：《論周昭王時代的青銅器銘刻》，《古文字研究》第二輯，第18—142頁；張懋鎔：《略說對周昭王南征的評價》，《古文字與青銅器論集》第二輯，第276—279頁，科學出版社2006年；李裕鈞：《新出銅器銘文所見昭王南征》，《新出金文與西周歷史》第275—28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做的原因自然是因爲昭王十六年征伐荆楚的勝利使得其政治野心變得更大,希望西周在南方的統治可以更加鞏固。中甌記載周王命令中“使小大邦,厥又舍汝芻糧”,此即周人希望把南方邦國視等同於西周中後期的淮夷,〔1〕自然會遭到部分南方邦國的反對。所以我們甚至可以認爲昭王南巡不返可能是這部分邦國聯合南方與周人處於敵對勢力的方國、部落一起反抗昭王的結果。〔2〕昭王南巡的失敗不僅在於“喪六師於漢”,更重要的是周人在南方建立的中心性聚落在昭王南征後都被迫遷移。

青銅時代中心性聚落常出土數量較多的青銅器,比如湖北盤龍城遺址和江西新干大洋洲遺址;西周時期尤其如此,可證以北京琉璃河遺址和寶雞強伯墓地。江漢地區也常發現隨葬一定數量銅器的重要墓葬,但這些墓葬的年代多爲西周早期和西周晚期,罕見西周中期青銅器。比如江漢東部的黃陂魯臺山墓地,該墓地出土西周時期青銅器 47 件,〔3〕集中於成、康、昭三代,〔4〕其中四件“公太史”鼎顯示該墓地與宗周的密切聯繫,該墓地很可能是西周王朝地方封國的公室墓地。〔5〕另一項重要發現源於湖北江陵萬城,該地區發現一座西周銅器墓,〔6〕出土 17 件西周早期青銅器,多件銅器上有“北子”銘文。還有兩項重大發現也只見西周早期青銅器,即隨州的羊子山鄂國墓地〔7〕和葉家山曾國墓地〔8〕出土了大量的青銅禮器,表明這兩處墓地即“伐虎方”組青銅器中曾、鄂兩國諸侯陵墓所在。以上發現證明湖北地區周王朝南方封國公室的墓地並沒有延續到西周中期。而這種現象也反映在一些非墓葬遺址,比如蘄春毛家咀遺址。地處鄂東南的蘄春毛家咀木構建築遺址和新屋灣銅器窖藏,〔9〕這兩處遺址相距不過 600 米,且同出帶“酉”字銘文的青銅器,應該是同一族群的遺存;據毛家咀遺址發掘簡報,該遺址出土陶器分西周和東周兩組,西周組陶器年代集中於早期。

江漢地區發現大量西周早期青銅器,而罕見西周中期青銅器,這暗示西周早中期

〔1〕西周晚期的兮甲盤(《集成》10174)記載:“淮夷舊我帛晦(賄)人,毋敢不出其帛、其責(積)、其進人,其賈,毋敢不即次即市,敢不用命,則即刑撲伐。”

〔2〕最近有學者研究,昭王南征不返與周人不明南方氣候有關,其說新穎,可作參考,見尹弘兵:《地理學與考古學視野下的昭王南征》,《歷史研究》2015 年第 1 期。

〔3〕黃陂縣文物館、孝感地區博物館、湖北省博物館:《湖北黃陂魯臺山兩周遺址與墓葬》,《江漢考古》1982 年第 2 期。

〔4〕陳賢一:《黃陂魯臺山西周文化剖析》,《江漢考古》1982 年第 2 期。

〔5〕張亞初:《論魯臺山西周墓的年代和族屬》,《江漢考古》1984 年第 2 期。

〔6〕《湖北江陵萬城出土西周銅器》,《考古》1963 年第 4 期。

〔7〕張昌平:《論隨州羊子山新出噩國青銅器》,《文物》2011 年第 11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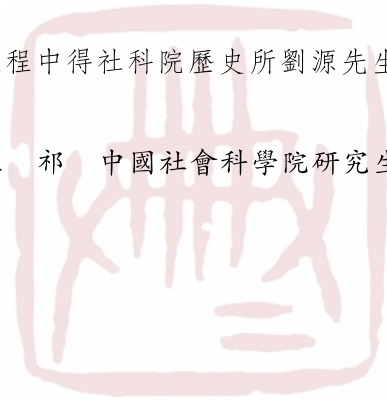
〔8〕李學勤、張昌平、陳振裕等:《湖北隨州葉家山西周墓地筆談》,《文物》2011 年第 11 期。

〔9〕吳曉松主編:《鄂東考古發現與研究》,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 1999 年。

之交該地區曾有過大的政治動蕩，導致該地區中心性聚落遺址被迫遷移；至於這種動蕩的原因，似乎只能從昭王南征失敗中去探求。昭王南征失敗後，周王朝在南方的封國感受到某種威脅，不得不遷移自己的國都，進而導致西周王朝在南方的政治版圖迅速收縮，〔1〕西周的封建擴張步伐被迫停止，從此進入一種戰略守勢。若果真如此，則昭王南巡的結果必然是災難性的，似乎不能對昭王南巡的結果抱有樂觀的態度。當然，昭王南征的失敗雖然對江漢地區政治格局有着激烈的影響，但這種影響的後果也僅僅是迫使周人收縮自己的勢力範圍，並非消滅了江漢地區的周人封國。無論是鄂國還是曾國，都繼續存在了相當長的時間，這說明昭王南征失敗後，南方的諸侯仍有時間與力量將國都遷於他處，避免自己成爲新興的地方勢力下的犧牲品。與包括曾國在內的“江漢諸姬”滅於春秋時不同，鄂國是因爲鄂侯叛亂而爲周厲王所滅的，〔2〕這本身就反映了昭王南征失敗後南方地區形勢的複雜。

附記：本文在寫作過程中得社科院歷史所劉源先生鼓勵和支持，謹致謝忱！

（王 祁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歷史系 博士研究生）



〔1〕關於西周江漢地區考古學文化的變遷與政治勢力的改變，我們還可以參考趙東升：《論鄂東南地區西周時期的考古學文化格局及政治勢力變遷》，《華夏考古》2013年第2期。

〔2〕徐中舒：《禹鼎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考古學報》1959年第3期。